

瞿秋白与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

丁言模

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东渐史上的卓越贡献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把普列汉诺夫著名的“五项式”和布哈林“社会系统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却迟迟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包括最近出版的一些不同类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论著。值得注意的是在30年代初，瞿秋白却又受到苏联批判普列汉诺夫“正统论”的影响，“修正”了自己10年前对于普列汉诺夫“五项式”的辩证认识，直接影响了瞿秋白的美学政治化的形成。尽管他曾第一个译介了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著名一信，译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集《现实》。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初传播时，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便于1903年由日本介绍到中国来。瞿秋白第一次提及普列汉诺夫，则是在1921年6月26日写的《反对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党》一文里，那时他正作为《晨报》记者在旅俄。1923年初瞿秋白归国后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郑译〈灰色马〉序》、《列宁与社会主义》等文中，瞿秋白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普列汉诺夫作评价和介绍，称他是俄国早期的“马克思派”，曾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和传播者，提出过许多精辟见解。但是他的社会革命理论有时脱离实际，后来成为列宁在政治上的批判对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瞿秋白以“独立性”的思考吸取了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思想方法和其他的哲学观点。

普列汉诺夫“五项式”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893年的《唯物主义史论丛》里。1907年《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则进一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归纳为5个方面，就成为我们所熟悉的“五项式”。普列汉诺夫的五段论是：一、生产力的状态；二、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关系；三、这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四、经济政治所决定的社会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的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对此还作了3点重要说明：第一，这个公式十分广泛，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可以给予相当的位置。第二，这个公式只从起源方面对5种社会因素作了规定。目的在于反对折衷主义，强调唯物史观的一元论性质。第三，这个公式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见解的进一步“说明”。^①这三点说明对于瞿秋白以后运用“五项式”时，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瞿秋白第一次引用“五项式”，是在他刚从苏俄归国不久写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923年3月）里。他认为，“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

而这种程序（指“五项式”各环节的递

^①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288页。

呈关系一引者)“是客观上当有的”。瞿秋白以此“程序”的因果关系,批判了“首足倒置”的唯心文化论。他认为,“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

1923年11月24日瞿秋白写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评论当时的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论战。他认为,“……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包含‘自然’、‘技术’和‘工力’三者^①)。社会现象变迁的程序大致可以说明如下:一、生产力之状态;二、受此等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三、生长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别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之社会心理(社会的人之心理);五、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家之宇宙观人生观)”。

这个“五项式”比半年前他所阐明的更为完整,弥补上了两个“部分”决定因素,接近于现在的译文意思。不过瞿秋白却把原先的第5项中“各种思想系统”改换成“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并注明是“社会思想家之宇宙观人生观”。瞿秋白是想说明这“社会思想”是经过“社会思想家”概括,而成为一种系统的、自觉的反映社会存在的理论观念,属于高级意识形态,不同于低级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五项式”的第4项)。但是以“宇宙观人生观”来加以说明,仍然有模糊了普列汉诺夫所规定的“思想体系”内涵和外延的嫌疑。后来瞿秋白在《社会科学概论》中,“一方面认为,“各种社会思想都是这些社会心理的反映综合而成较有系统的”。另一方面稍有变化的认为,“社会思想是指每一时代普通民众的思想方法(“时代逻辑”)以及他们对于宇宙现象及社会现象的“解释”(文中重点原有,下同。)把原先“社会思想家”扩大为“每一时代普通民众”

但仍然注明是“宇宙观及人生观”。

不过瞿秋白强调的“社会思想”(思想体系)为“宇宙观人生观”是有特定涵意的,是针对当时的玄学派唯意志论的宇宙观和“科学”派“自然主义人生观”(胡适)而言的。瞿秋白把双方所争论的问题焦点归结为,“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瞿秋白正是运用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解决此难题,批判了“科学”派的非决定论,驳斥了玄学派指责唯物论是宿命论的谬论。

能够集中地体现瞿秋白“独立性”地理解和运用“五项式”的例子,那还是在1924年6月18日写的《社会科学概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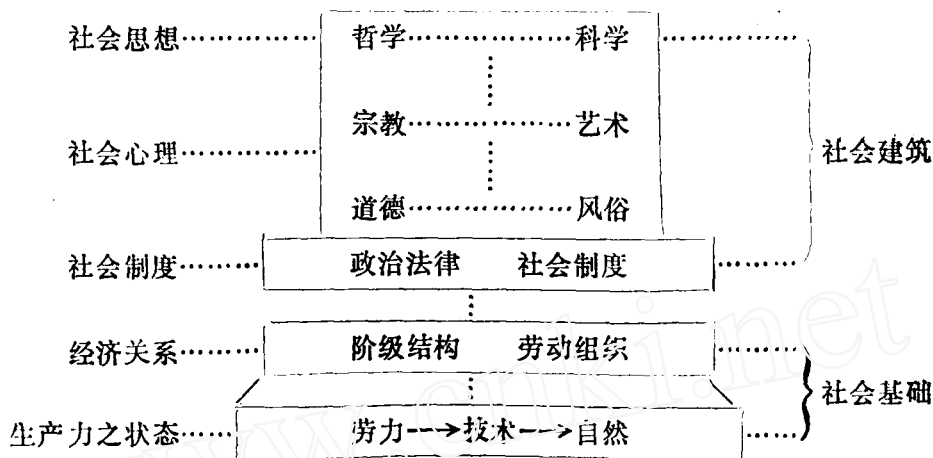
该著作介绍了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总结”。

《社会科学概论》是瞿秋白在1924年上海夏令营讲学时的讲稿,同年10月由上海书店正式出版,其影响相当大,以后又重版^②。该著作近40,000字,分为12个章节。在第12章节“社会现象之联系”中有一个“社会结构”图例(见第50页图表)

虽然这个图例的最初来源暂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这个图例就是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并且其中明显地融合了布哈林“社会系统理论”的图解示范。如果说这是瞿秋白第三次引用“五项式”,不如说是已成为具有瞿秋白理解特点的社会结构图例。这个图例的左侧名称是“五项式”每个环节的主词,由下往上有规律的递呈,显示出它们之间关系的“相当位置”。右侧将“五项式”每个环节分为两大部分:社会基础和社会建

^①瞿秋白认为的生产力“三者”与一般说的3要素相似,详见《社会哲学概论》第2章节有关内容。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②30年代党的地下出版社—北方人民出版社将书名改为《社会科学研究初步》,看译者改为布得浪尔若、杨青震译。



筑。这正是普列汉诺夫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贡献。

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把它当作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当作包括政治法律关系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基础，用这个基础的进化来解释社会进化的一切其它方面^①。并且他注意到有两个经济基础的定义，其一、是指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其二、则进一步包括生产力，即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两个定义都对都有益。他在独立叙述自己的“五项式”思想时，就使用恩格斯的观点，便把“五项式”划分为两大项。这样可以大大地扩展上层建筑的范围，苏联学者曾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②因此瞿秋白这个图例是充分理解普列汉诺夫“五项式”的思想贡献。他也在解释图例时说，社会“基础是生产力之状态及经济关系，这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其他一切现象的根本”。

这个图例的中间主体外形呈宝塔状，形象化地突出了坚实的“基础”及依次产生的“上层建筑”各因素。“宝塔”里面的各名称则是“五项式”每个环节具体内容的代表，各个“宝塔”层(环节)内外之间都有流向性的符号，表示“互动”的极繁复的因果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宝塔状社会系统理论

结构。

如果注意一下图例中间“宝塔”层内的各个名称与《社会科学概论》的关系，就会发现前者与该著作的12个章节标题存在着有机联系。后者的标题是：总论、社会之意义、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社会现象之联系。在最后一节的图例前面有一句话，“总之所论，社会的结构可以略示以下图：……”另外再注意一下各章节的开头说明和内容的叙述，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概论》的整体构思和论述中心都是围绕着“五项式”。前面各个章节是分述“五项式”的各个环节内容和性质特点(在此不再详细赘述了)，最后的这个图例则是“总之所论”的图解化的总结。

对此，瞿秋白说明道，“社会生活的总象大致如此。各种社会现象都有相互的联系，绝非独立自主的，而且每种现象既自成其为一系统之后，又各有内部的发展公律，不过社会是包含这些种种现象的一大系统，他的基础是生产力之状态及经济关系，这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其他一切现象的根本。可见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各种现象的内部发展公律——社会心理上，如群众心

①②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296、297页。

理的自然公律；组织技术上，如生产或行政机关的机械公律等——错综交触，又间接直接的受经济基础发展的影响……”。

瞿秋白终于初步揭开了极繁复的社会结构“程序”及其变迁之谜，而且在“不可理的乱丝”社会现象中总结出唯物史观的6个“真义”。

第一，生产力之状态是社会最后的根底——是社会结构内的物质成分（人与自然的接触点）——这是历史的（社会的）唯物论的根据。

第二，物质世界永久在流变之中，经济也是如此。经济的流变可以生出和消灭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经济的流变能生长和变更社会制度、风俗、艺术、科学。

第三、政治、哲学、思想等既然是“社会的实质”（经济）之产物，当然可以求他的因果联系。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政治、思想等当然能返其影响于经济。不过政治及思想等只能做经济数量上的变更之助缘，而不能做政治性质上的变更之动因。

第四、大致而论：经济的基础——技术，因人类以之适应自然而日有变易，经济关系因之而变，政治制度及法律亦就渐渐变动，于是社会心理潜伏新潮，久而久之，社会思想就大起激变，凡此都还只是数量的渐变，——所谓“进化”。这些根源于经济的变更，逐步帮着经济进化，积累既久，便引起社会上的突变——“大革命”。在渐变与突变的社会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中，由于发展形势使各地域进化迟速极不相等，演成种种复合形式，再演成所谓同化过程，以直达于共产主义。

第五、基础变易到一定的程度，不得不破坏这些种种旧建筑。要建设新的，不得不破坏旧的。要恢复旧的，也不得不破坏新的。所以破坏有两种：一是退步的，一是进

步的。革命的怒潮时期一定有很大的破坏，是建设的代价，亦是建设的第一步。如果社会舍不得牺牲，不是容忍，便是复旧。“进一步、退两步”，永久不得建设。

第六、人的行为既是社会现象的一果，又是以后的现象的种种助缘。人在既知这社会规律之后，必然更加努力而且有方法在可能范围内造作此“缘”，决不坐待天国的降临，甚至复古和维持现状。所以“社会运动者”——阶级斗争的指导者，在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之中当然要具有真正的社会科学智识。

（以上引文是概括性的，详见原文。）

以上6个“真义”，可以看作是瞿秋白运用“五项式”和“社会系统理论”的理性结晶。其中第6个“真义”其实是瞿秋白“运用”的重要宗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这不仅鲜明地体现在《社会科学概论》等文中，而且也是瞿秋白一生的座右铭，虽然有时也有失误。

前3个“真义”中，瞿秋白在批判张君勱等人所谓的“科学”唯心论的同时，阐述了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再次强调了社会现象的必然因果律。其中瞿秋白指出，“政治及思想等只能做经济数量上的变更之助缘，而不能做经济性质上的变更之动因”。这结论击中了张君勱等人唯意志论和非决定论的要害，鲜明体现“五项式”思想的“中介环节”观念的辩证力量。这也是至今继续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

第4个“真义”则是在前3个“真义”前提下，主要依据“五项式”而描述社会结构变迁的一般发展规律，比原先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中的描述更为完整些，逻辑性也更严密些，并且删除了原先以社会心理与个体、群众动机的“转换”。另外又打通了渐变论、突变论（进化和革命）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通道，（这问题原先在《现代社会学》等文中是分开叙述的）把唯物史观的一

元论与社会革命的现实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瞿秋白还扩展了社会结构变迁规律的视野范围，着眼于世界社会革命进程：“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前后”→“启蒙时代”→“贵族经济的消灭”→“资产阶级式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直达于共产主义”。这不仅反映了瞿秋白很好地理解了普列汉诺夫对“五项式”的3点说明，而且他借助多元化的广阔文化视野，进一步描绘出“五项式”与“社会系统理论”相结合的潜在理论前景。因此在这意义上来讲，这6个“真义”代表了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高理论水平，瞿秋白也毫不愧色地可以称为在中国最早地较为成功地传播和运用“五项式”和“社会系统理论”而进行探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苏联直到70年代才承认，普列汉诺夫“五项式”等，对于叙述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十分明显地是一种系统观点、一种卓有成效的和进一步根据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所必需的观点”^①。中国则是在80年代才开始注意到“五项式”与现代系统论之间的关系。

不过也应看到瞿秋白在探索和传播过程中仍存在着不少直线思维的倾向，这在30年代初则又令人遗憾地进一步发展。当时苏联批判普列汉诺夫“正统论”的影响折射在瞿秋白身上，引起了两重性的反映。一方面瞿秋白仍然尊重历史，坚持例举了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高度评价。瞿秋白认为，“假使普列汉诺夫是纯粹的完全的孟塞维克主义的艺术理论家，那么，国际无产阶级就用不着去接受什么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普列汉诺夫……他在1905年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实行过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列宁说过，‘如果不研究——而且正是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一切哲学著作，那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籍之中的最好的著作。’列宁认为普列汉

诺夫的哲学论文，应当成为共产主义的必修的教科书。”^②瞿秋白在当时反对“正统论”的强大政治旋涡中，仍然坚持“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普列汉诺夫”，而不会被戴上“孟塞维克”的可怕政治帽子，真是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瞿秋白又似乎赞同苏联米丁派（取代“正统论”的德波林派，其实这两种极端的论说都是错误的。）的某些主张，他在《论弗理茨》和《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等文中，则严厉地批判他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不会不影响到他的文艺理论”，并指责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中“恰好把阶级忘掉了”。由于瞿秋白认为，“哲学和政治”、“艺术和哲学政治”都不能够“分割”的。^③因此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和文艺理论便结合起来而成为瞿秋白的批判对象。

至于瞿秋白认为“五项式”“恰好把阶级忘了”，这个观点也是当时苏联学术界的看法。苏联一些学者认为普列汉诺夫“由于没有把作为阶级社会中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的阶级斗争列入自己的公式，他就犯了错误”^④。但到70年代他们又认为，只要“健康地考察”一下这个公式和普列汉诺夫的一切哲学著作，上述指责就不攻自破了。而且“国家问题，正如阶级问题一样，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是包括在‘社会政治制度’概念中的”^⑤。

瞿秋白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主要来源于苏联，这从当时共产国际内部政治斗争和中国党内斗争的实际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把普列汉诺夫作为客观主义唯心论的典型来批判，而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瞿秋白自己曾经给予高度评价的“五项式”的辩证思想，则不能不使人深思。

①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379页。

②③瞿秋白《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⑤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363页，第366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11月版。